



Rational Thinking in Economics

经济学的常识理性

王则柯 著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Rational Thinking in Economics

经济学的常识理性

王则柯 著

 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4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经济学的常识理性/王则柯著. 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
2014

ISBN 978-7-100-10641-2

I. ①经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经济学—文集

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90098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经济学的常识理性

王则柯 著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

ISBN 978-7-100-10641-2

2014年9月第1版

开本 880 × 1230 1/32

201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张 8%

定价: 28.00 元

题 记

国人习惯一起讲“真善美”三个字，
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徽，
却只标榜“真”和“美”。

善良的人们曾经设想越有用的东西应该越贵，
形成使用价值论，
却发现并非如此；
善良的人们还曾经设想越难做出来的东西应该越贵，
形成劳动决定论，
同样远离事理。

或者你更加善良，
因为他是一大串头衔和荣誉的学者，
就以为他一定掌握真理，

结果仍然不是这么回事。

面对各种迷雾或者光环，
大家要珍惜自己的常识判断。
这样，
人们的智慧，
才可以不因他们善良而被蒙蔽。

说 明

这个集子五年多以前曾经在中信出版社出版，现在作了些许修订，得到中信出版社同意，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新的版本。

我的电子邮箱是 Lnswzk@mail.sysu.edu.cn 和 ch84111987@163.com，诚挚地欢迎读者和师长的批评。

王则柯，识于辛卯年深秋

目 录

常识篇

- 003 / 经济学的常识理性
- 041 / 经济学讨论中的假设和模型
- 056 / 信息经济学奠基人
- 077 / 信息经济学视角的诚信建设
- 105 / 博弈论框架的信用建设
- 149 / 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的沉重代价

方法篇

- 163 / 经济学教育现代化的片段轨迹
- 175 / “张五常热”和“吉芬现象”
- 187 / 重写政治经济学
- 197 / 提供思想的经济学课本
- 208 / 想起了“无缘无故的爱”
- 216 / 没有证明不了的命题吗？
- 220 / 品评林毅夫的《论经济学方法》

附

- 226 / 2011 年 9 月迎新讲话

常 识 篇

经济学的常识理性¹

汪丁丁（以下简称汪）：我先介绍一下王老师。他最近有两本非常重要的书。1990年代有一本，是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《拓扑学方法和经济学应用》，还有一本是200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经济学拓扑方法》。这两本书都是非常重要的。王则柯老师在学术上比我们大了一辈。1965年，他从北京大学数学和力学系毕业，导师是江泽涵教授和姜伯驹教授，这两位老先生的著作都是我案头必备的，但说实话，我并不怎么看得懂。到1970年代，王老师进入中山大学，现在是中山大学的经济学和数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王老师原籍浙江，他是浙江永嘉人。王老师的简历大致上是这样。

叶航（以下简称叶）：下面我们就请王教授给我们作一个讲演。这个讲演可能不是很深奥，但很重要。王老师讲完后，大家可以

1 2005年4月23日下午在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讲话，汪丁丁教授主持，叶航教授、罗卫东教授等参加，贾拥民博士整理讲话录音，特此致谢。收入本书时有删节。

进行讨论。

王则柯(以下简称王):我跟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,以及叶航教授、罗卫东教授在前年就有过联络,当时就想到这里来,但2003年由于SARS的问题,就拖到现在。至于我跟丁丁联络的时间就更早了。

我一直看《万象》这本杂志。最新一期《万象》的第一篇文章,说的是蔡元培。蔡元培执掌北大的时候,北大的系科设置与原来相比有很大的改变。当时设了15个系,蔡元培自己是浙江人,这15个系里面,大部分系的系主任也都是浙江人。文史哲,即中文、历史、哲学,这几个系的系主任都是浙江人;教育系、经济学系的系主任也是浙江人。不仅如此,数理化,即数学、物理、化学各系,以及地质系的系主任,都是浙江人。由此看来,浙江这个地方,真是很了不得。

浙江是我的故乡,我觉得自己也沾了浙江的光。我在浙江永嘉乡下生活到四岁多,但温州市区基本上没有待过,然后在杭州待了一年左右,所以我还记得之江大学,记得六和塔,记得钱塘江。后来就经上海到广州去了。

汪:那是不是因为要躲避日本人?

王:不是因为日本人,是因为我父亲离开杭州的之江大学到广州的中山大学,于是我们全家都去了广州。永嘉还有一位大学者叫刘节,他介绍我父亲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。关于刘节教授,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。他是陈寅恪先生的学生,当年陈寅恪先生被

批斗得很惨的时候，刘节教授自己也已经七十多岁了，但他还是站了出来，说“让我来替我的老师挨斗”。真是很了不起。

我随父亲去广州，中学毕业以后到北京念书，又在上海教了十年中学，然后回到广州，这样一圈下来，已经有五十多年没有回过温州那个地方去了。2002年去了三天左右，其中到楠溪江半天。那次在杭州待的时间比较长。我非常喜欢杭州，以后我每年都要来。如果全家都能够到这儿来度假，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。

我对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很感兴趣，很想了解一下。刚才叶航教授去接我的时候，我们在车上就谈了一些。我觉得这个事情难度很大，这个跨学科的研究怎么开始呢？所以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。既然来了，那总是要讲点什么东西的。我给了丁丁两个题目，一个是比较浅的，“经济学的常识理性”；另外一个是比较深一点的，“零测度与博弈论的奇数定理”。丁丁选了这个浅的，不用写黑板，那我们就坐下来聊天，不一定能给大家多少帮助。

这几年，我是有一点虚名的。但如果把我说成是“著名经济学家”，我不敢认同。如果说我是“著名经济学教师”，就比较合适一些。我创造的东西不是很多，但是在经济学教学方面确实有一些体会。

我与丁丁的交往，始于《读书》杂志和沈昌文先生。当时，我们都是《读书》的读者和作者，丁丁的每一篇《经济学关键词》，我都推荐给学生。沈昌文先生还具体介绍我跟丁丁联络。那

是1994年，我刚从美国短期访问回来，到了香港中文大学。因为在此之前我在香港停留的所有时间加在一起也不到十天，对香港不大熟悉，就请沈昌文先生给我介绍一些在香港的朋友。沈先生对我说，你到香港，可以找丁丁。上个月丁丁到我们学校，讲起这件事，说还是很感动，因为那时候是他“最困难的时候”。但我与丁丁每次都阴差阳错，没能见面。我跟北京的梁晶也很熟，梁晶也总提到丁丁，一直想让我们见见，但没如愿。有一年我到北京，有半天空闲，我跟丁丁联络，可是那天下午丁丁要上课，还是没有见到。终于上个月丁丁他们到了广州，我们才见了面。

但是我的走向跟丁丁很不一样。八年前，丁丁的《在经济学和哲学之间》出版的时候，华东师大的许纪霖教授让我写一个书评，说“非你莫属”。我其实很早就买了那本书，这时候拿出来看，一看之下，我对汪丁丁教授知识的渊博佩服得不得了。我读书比较少，这也许跟你们的想象不一样。刚才座谈开始之前叶航、卫东讲到他们的同学鞠实儿。鞠实儿研究哲学，主要是逻辑，研究得非常好，他有些学生，也来听我的课，我就讲过一些不太恭敬的话。我说，如果你现在要学牛顿力学，不一定去啃牛顿的《原理》，好的物理学课本，已经写得很清楚。我看书比较少，这是一个缺憾。但是丁丁的书，大家翻开来看，很多哲学。我从丁丁那本书知道，差不多从两百年前开始，到一百年前，在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面，经济学从道德哲学中分离出来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一件好事情，经济学从道德哲学分离出来，我们经济学人就有点事情可以做了。

可是这件事情在丁丁看来是很痛苦的,他在书里面写道,要“对抗”这个“不可抗拒的过程”。这个过程,指的就是经济学从道德哲学里面分离出来的过程。

就在我读丁丁这本书的那段时间,在我们国家就有过一场关于经济学问题的争论。这场争论的两个代表人物,一个是经济学家张曙光,另一个是历史学家秦晖。争论的主要是有关国有企业改制的一些问题。秦晖教授对国企改制的实际变化和相应的理论或者论证很不以为然。与这个争论掺和在一起的还有《读书》杂志的变化。《读书》杂志在沈昌文先生主事的时候达到可读性的高峰,很多人后来都回顾说那时候和那以前的《读书》好。自从沈昌文先生奉示离开以后,新任主编把后现代的东西引了进来,搞得这个杂志像是同仁刊物似的。这两件事情掺和在一起,我对这种所谓后现代的语境颇为反感,曾经写过文章表达对这种“后现代语境”的疑虑。当然,在这些事情上,我清楚自己完全是边缘的,主要是他们两边在争来争去。我发现从那个时候开始,出现一个术语,叫作“常识理性”。按照他们那些人的说法,我们现在头脑里面所有的思考,都不过是“常识理性”,达不到他们那些“知识理性”的高度。要达到他们所谓的“知识理性”的高度,一定要受过“后现代”的训练,使用后现代的话语才行。说实在的,到底怎样才算是他们所说的“知识理性”,我到现在还概括不出来。但是从现象上来看,就是一定要在文章中出现很多哲学家的名字。张曙光和秦晖两位教授争论的文章里头,大段大段都是这个那个

哲学家说的话，以及作者的诠释。为什么会这样，我不大能理解。在我看来，那样一个发展，并不是很好的发展。所以，本来今天我准备好的 PPT 的第一个标题，就是“缘起——知识理性、常识理性、哲学理性”。

我今天要谈的“常识理性”，非常重要。这个常识理性，不是人家贬斥我们的时候所说的那种常识理性。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，是登在报纸上给普通读者看的，题目是《智慧何以被善良蒙蔽》。在经济学说史上，人们的智慧被善良蒙蔽的例子很多。首先可以谈到一个有关经济学的最根本的问题。毛泽东有一句描述很有意思，大意是：商品这个东西，大家每天都接触它，但没有人注意它，只有马克思是个例外，他注意到了。马克思这个切入点很好。接下来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，商品的价值价格由什么决定？如果是大量的商品，那是价格；如果是单个的一样东西，那是价值。

关于商品的价值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个经济学的基本问题，在历史上，我设想是出于善良的本性，人们曾经设想和相信，越有用的东西就应该越贵，就是说不那么有用的东西应该便宜，比较有用的东西应该贵一些。于是，就出现了“使用价值论”。但是这样一来，很快就经不起推敲了。对人类社会来说，最有用的是水这样的东西，因为如果没有水，人类社会本身就不复存在。然后跟水成为对照的是宝石。懂得一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，“水和宝石”这个悖论在科学史上是非常著名的。宝石当然也非常有用，但至少有一点，宝石你可以找到代用品，没有宝石，人类社会照

样前进，而没有水，人类社会就会灭亡。可是，在现实社会里，水比宝石便宜多了。这样，就否定了使用价值论。

接下来，同样可以设想是一些非常善良的人，他们就开始想，应该是越不容易做出来的东西越贵。这就出来了“劳动价值论”。结果也不是这么一回事。我们知道，双胞胎有一些是同卵双胞胎，还有一些是异卵双胞胎。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，说到一对不同卵的双胞胎，出生于同一个家庭，生出来就一个比较聪明，另一个不那么聪明。虽然他们父母一样，家庭一样，出生时间几乎一样，接受的教育也一样，他们自己的努力程度也很难说不一样，但是这对双胞胎后来的社会实现却很不一样。这就不能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了。大家可以想想，很多东西，不一定就是积累的劳动多，价值就一定高。

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人觉得印度可能会在经济上对中国形成威胁。北京就已经开过几次这样的会。大家最终的结论普遍是，印度要在经济上超过中国，还早呢。但是有一点，印度现在已经比中国强，那就是印度的资源效率要比中国高。所谓资源效率，本来考虑的是这样的问题：每产出一万美元的产值，你需要消耗多少煤炭多少石油？实际运用的是它的倒数，比方说每消耗一吨标准煤，可以生产出多少产值。资源效率最高的是日本，其次是美国。十多年前有一个统计，日本的资源效率大概是中国的十三倍，美国大约是中国九倍、十倍，印度大约是中国三倍。我们的资源效率为什么那么低呢？表现上看，我们的经济发展得

很不錯，可是我們的資源消耗得太厲害，我們的污染太厲害。大家可以想想，其實這裡面的根子就是勞動價值論。你看看過去和現在一些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是怎麼說的就知道了。它們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的，我說它們是假馬克思主義。這些教科書說，一定要有勞動凝結在里面，才有價值。那麼我現在問一下，我們現在跟日本爭這個釣魚島，難道這個釣魚島凝結了人類的什麼勞動在里面嗎？再講我們挖的煤炭，煤炭形成於人類出現之前，它到底凝結了多少人類的勞動價值在里面？其實，它們都是大自然的傑作，是大自然的結晶，是我們這塊土地賦予我們的。我記得非常清楚，我在廣州念完高中，上北京讀大學，坐火車經過清澈碧藍的北江離開廣東，兩岸是茂密的原始森林。可是那時候已經開始砍伐原始森林了。現在北江兩岸也有森林覆蓋，但那不是原始森林，只是因為廣東氣候條件好，新長出來了次生林。原始森林有什麼勞動凝結在里面？怪不得過去我們計算木材的價格，就只算雇了多少工人，用了多少柴油或者電力把它砍下來，拖到江邊，運到你那個地方，就只算這個勞動成本。這樣算，我們的資源有什麼辦法能不被浪費？本來，價格是最權威的市場信號，應該是資源稀缺性的度量，這不是單單用勞動量或其變種能夠衡量的。這個道理，現在大家都明白了。山西是個資源大省，以前的情況却是，煤炭挖得越多，山西越窮。這樣的一個格局一旦形成，化解並不容易。它的後果之一，就是我們的資源效率直到現在還落在印度後面。